

北京师范大学新世纪教育教学改革丛书

时代使命

北京师范大学与中国教师教育改革

朱旭东 胡艳 施克灿 方增泉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京师范大学新世纪教育教学改革丛书

时代使命

——北京师范大学与中国教师教育改革

朱旭东 胡 艳 施克灿 方增泉 著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代使命/朱旭东著.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3
(北京师范大学新世纪教育教学改革丛书)
ISBN 978-7-303-09136-2

I. 时… II. 朱… III.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改革—研究
IV. G659.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4494 号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 bnup. com. cn](http://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48 mm × 210 mm
印 张: 9
字 数: 196 千字
印 数: 1 ~ 1 100 册
版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责任编辑: 马晓薇 装帧设计: 李 强
责任校对: 李 菡 责任印制: 马鸿麟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前 言

经过 106 年的改革发展，北京师范大学正在努力建设成综合性、有特色、研究型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她所具有的影响力超越了国界，超越了教师教育本身，同时与整个中国教师教育共命运、同呼吸。北京师范大学是中国教师教育的旗帜，她不仅在教师教育理论的创新上独树一帜，而且在教师教育制度、模式、机制的创新上，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百年的教师教育变革，在教育理论创新、教师教育改革、国家宏观教育决策和教育立法以及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中国教育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表现出了一所大学应当具有的社会责任感和为国家服务的使命感。

《时代使命——北京师范大学与中国教师教育改革》是北京师范大学“新世纪教育教学改革丛书”中的一册，也是由学校委托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承担的院校研究课题。本书以我国师范教育的产生、发展和变革为主线，比较系

统地诠释了北京师范大学在中国百年教师教育改革中的每一个脚印所留下的深刻意蕴，既有成功的探索，又有改革的艰辛和坎坷。

本书是集体完成的，第一、二章主要由胡艳撰写，第三、四章主要由施克灿撰写，第五章主要由朱旭东撰写，方增泉参与了部分内容的撰写。周钧和赵明仁分别承担了第五章中“国际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教师教育经验”和“‘4+3’学士后教师培养模式建构的设想”部分的撰写。

本书试图以学术视野来阐述北京师范大学在中国教师教育百年变革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并对未来改革和发展趋势进行了理论探讨。由于时间仓促和水平有限，写作中有不当之处，请各位同仁不吝指教。

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

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 朱旭东

2008年1月

目 录

第一章 晚清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奠基者	1
第一节 中国师范教育产生的原因	1
第二节 中国最早的国办高等师范学堂的诞生	9
第三节 确立独立的高等师范教育制度	15
第四节 发凡起例作用和历史地位	33
第二章 民国时期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守护者	38
第一节 民国初期蓬勃发展的高等教育	38
第二节 建立本科层次的北京师范大学	43
第三节 建立本科师范教育制度	49
第四节 关于中国师范教育的价值的论争	88
第三章 建国初 17 年社会主义高等师范教育制度的探索者	105
第一节 确立新中国的师范教育制度	106
第二节 新中国师范教育的理论探索	126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师范教育改革的先行者	143
第一节 重建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的质量保障体系	143

第二节	引领新时期中国教师教育的思想更新与培养模式创新	175
第三节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校训精神的孕育与弘扬	193
第五章 战略转型中的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教师教育的引领者	201
第一节	北京师范大学的“战略转型”	202
第二节	综合性、研究型师范大学的教师教育	208
第三节	综合性、研究型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制度的探索	238
第四节	战略转型的趋向是建立现代大学教师培养体系	267

第一章 晚清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奠基者

中国师范教育已经有百余年的历史，百年来中国的师范教育为中国的基础教育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高素质师资，提升了国民素质，加速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和社会现代化水平。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是京师大学堂的核心与基础，也是京师大学堂学生高扬爱国精神的策源地。师范馆不仅办学严谨，成效显著，而且作为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实为近代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的起点，其发凡起例，影响深远。同时，也历经坎坷，为自己的生存曾奔走呼号，历尽艰辛。北京师范大学百年的历史，就是中国现代高等师范教育发展的历史缩影，也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寻求教育兴国之路的历史记录。

第一节 中国师范教育产生的原因

我国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教师教育制度是在清末建立的。中国最早的师范学堂是 1897 年盛宣怀在上海创办的南洋公学师范院。中国最早的高等师范学堂是 1902 年清政府举办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此时，中国的现代学制尚未产生，中国的新式教育尚在萌芽中，可以说从国家到民间根本没有普及教育的愿望。西方国家普遍源于教育普及需要而促进师范教育产生的土壤在当时的中国尚未形成。

那中国的师范教育缘何而起？结合中国近代社会的实际情形，答案是两个：一是“救亡图存”、“教育救国”；二是直接借鉴国外的师范教育制度。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作为官方第一所高等师范学堂，从建立到形成制度，呈现了典型的上述特点。

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高等学府是京师大学堂。她的建立源于进入工业化社会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的强取豪夺；源于古老的文明如何培养适应新时代需要的人才，对抗西方的入侵，提升民族的竞争力。

一、传统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无法应对西方的侵略，救国图存

鸦片战争前，中国基本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制的传统农业社会，教育体制服务于科举选士，主要培养和选拔官僚和士绅。这种教育体制在面对由外来冲击带来的巨大经济社会变化时，已无法适应。

以资本的扩张、资源的掠夺、产品的倾销为特征的资本主义世界力图把中国变为第二个印度，成为他们快速发展的资本扩张地，资源掠夺地和产品倾销地。由于中国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加上政府在对外贸易中实行限制和防范的政策，使得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的阴谋难以得逞。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实现资本的扩张，在中国悍然发动鸦片战争并进行经济文化侵略。

鸦片战争使西方商人向中国大规模地推销鸦片合法化，鸦片成为他们追逐高额利润并改变对中国贸易逆差的重要手段。鸦片战争的枪炮也同时轰开了闭关自守、自给

自足的中国社会，使泱泱大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震荡和屈辱。

其结果，一方面，西方商人大量收购茶丝等农业产品，使从事小农生产的中国的农民卷入了他们所不了解的市场。“不平等条约开始于中国普通民众尚未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时候。”^①中国的农民不得不忍受从当地小商贩、中国大商人到外国商人的重重盘剥。伦敦和纽约茶市场、丝市场的价格支配着他们微薄的产品价格，支配着他们的命运。另一方面，西方的工业品大量倾销到中国。因其廉价，而使原有的农民家庭手工业和城镇手工业受到了排挤。农民和手工业者生计极为困难。“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②

但我们的传统教育却没有培养出应对这种变化环境的新式人才。当时的中国社会既没有掌握现代军事技术的军事人才，也没有应对新竞争的掌握现代农业、现代商业、制造业、法律等方面知识的人才。传统的教育只能培养“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迂腐书生，被动挨打成了无法避免的结果。

① 费正清：《剑桥晚清中国史》（上卷），23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6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二、教会学校的大量举办冲击了中国的传统教育

西方的人侵不仅剥夺了中国富饶的物质资源、广袤的土地、丰富的劳动力，而且，他们通过在中国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形式，对中国传统的道德观、价值观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而对传统中国社会影响最大最深远的当属教会学校。

早在鸦片战争前夕，为了在中国培养基督徒，西方传教士开始在中国开设教会学校。最早开设的教会学校是1835年伦敦妇女会在澳门开设女子学堂。1835年英国传教士布朗在广州开设小学。1844年英国东方女子教育促进会在浙江宁波开设女塾。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传教士在通商口岸开设了不少初等性质的教会学校。如1845年美长老会在宁波开设的宁波学塾，1850年英安立甘会在上海设立英华书院；1847年美天主教会在上海开设针对女子教育的圣芳济书院；1860年美长老会在上海开设女子学堂——清心书院；1864年美圣公会在北京开设贝满女学；1867年美公理会在北京开设潞河书院；1884年传教士狄考文在山东开设登州蒙养学堂等。

这些早期的教会学校办学极其困难。它招收的对象是无家可归和穷苦人的孩子，不仅吸引他们就学，在免收学费的同时，还要提供衣食和补助。所教的内容也以宗教为主，授以简单的西方现代课程。英语是其教学语言。但教学内容和方式与传统的以传授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以科举考试为主要目的的中国教育有很大的区别。正是这些区别，使得接受过教会教育的人能更适应变化中的中国社会。

会。这些教会学校的学生因掌握英语和与洋人接触的经验，成为最早与西方商人做贸易的买办。由经济地位提升所带来的家庭生活的改善迅速改变了中国人对教会学校的印象。同时，这些学校还培养了中国最早学习西方文化的人士，如我国留学西方第一人的容闳和第一个西医黄宽，以及伟大的孙中山先生均是早期教会学校的学生，他们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中坚力量。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教会办学的策略开始发生改变：办学层次由初等教育转向中高等教育；招生由面向底层百姓转向面向中上层子弟；办学目标由培养传教士转而使整个中国基督教化。

此时，教会学校发展更为迅速，各教会不仅在各通商口岸创办教会学校，而且开始深入到内地开设学堂，并开始建立中高等层次的学校，开创了中国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中高等教育机构。如，1879年美圣公会在培雅书院和度思书院的基础上建立了梵王渡英语专科学校。1888年美以美会在南京创办的汇文书院。1895年美圣公会在贝满女学的基础上创办了华北女子协和大学；1885年美以美会在怀理书院的基础上建立北京汇文大学，是后来的燕京大学的前身之一。1893年美公理会在北京潞河男塾的基础上扩充为潞河书院，1904年为北通州协和大学，成为燕京大学的前身之一；1902年，耶稣教长老会合并登州文汇馆和青州的广德书院为“广文大学”（齐鲁大学的前身）。1904年上海浸会大学成立（1915年改名为滬江大学）；宣统三年，汇文育宏书院合并为南京金陵大学。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以中高等教育为主要发展，为中国建立了最早的现代中高等教育，也给中国社会全面展现了由初等到高等的现代西方教育体系。它们培养的学生不仅享受到由西方教育带来的物质生活的提升，也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相应地，传统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很难适应这变化的世界，也难以改善自身和家庭的生活水平。传统教育的改革势在必行。教会学校的建立发展无疑也为志士仁人创办中国现代教育提供了现成的模板。

三、清统治阶级中的先进分子开始建立新式学堂

面对来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入侵，如何培养引领中国社会走出困境的新式人才是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清统治阶级内部的一部分开明人士和进步知识分子，开始对传统文化、传统教育进行反思。维新运动的领导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通过考察，把中国衰弱的根本原因归之于教育不良、学术落后，认为救亡之道应从改良教育入手，变科举，兴学校，育人才，开民智，引进西方和日本的教育制度。在全国各省、府、州县、乡普遍设立学校，形成由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相互衔接的、普通教育与专门教育并举的学校教育体系，以实现救亡图存，拯救中国之目的。

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创办有别于以博取功名为目的的学堂。洋务派在建立洋务军事企业的同时，创办了洋务学堂。随后，一些先进分子开办西式普通中小学。如1878年，邑绅张焕纶协同当地绅士共同举办上海正蒙书院。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津海关道盛宣怀在天津创设头、二等学堂,开设现代学科课程。1897年,盛宣怀又在上海创设类似的南洋公学。1896年,浙江绅士孙诒让创办瑞安计学馆。后来又创办方言馆、瑞平化学馆、瑞安普通学堂、蒙学馆、高等小学堂、女子初等学堂等。(1896)上海的育才书塾由邑绅王维泰创办,杭州的安定中学(1906)由邑绅胡乃麟创办,天津的严氏家塾(1898)由严范孙创办(后改为南开中学),上海的三等公学(1898)由邑绅钟天伟创办。届时,张之洞在湖北创办各级学堂,涉及普通中小学,高等学堂。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则于1895年设强学会于京师……到了19世纪后期,私人和洋务人士兴办的仿照西方的教育制度的新式学堂已具相当的规模。

四、新式学堂发展促使民间师范学堂的产生

晚清的中国社会已经由西方传教士和开明的士大夫建立了不少有别于传统中国教育的新式学堂。大量的新式学堂的举办迫切需要能掌握现代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教学方式的新式教师。师资成为影响新式教育发展的瓶颈。

教会学校发展的初期,往往一两个传教士为更有利的传播福音而设学招生,作为开拓者他们是学校仅有的教师。宁波女塾就是伦敦东方妇女教育促进会成员爱尔德塞小姐主持,相当长的时期内,她是学校唯一的教师和主持人。登州蒙养学堂主要是狄考文夫妇主持。他们不但设法筹募经费,购买地基,建筑学堂,招募学生,而且还是除中文教师之外的唯一教师。随着教会学校因中国的革新日益壮大后,最大的障碍是缺少合格的教员。如果雇佣异教

徒，他不太可能教很多的基督教内容，而雇一名教徒则可能是能力不够。为了维持教会学校的运转，促进学校的发展，不少教会学校在办学的同时，开始建立师资培训班，进行最早的新式教师培养。19世纪的中后期，一些教会学校陆续开始设立师范班，仿照西方师范学堂培养教师。1901年，中华圣公会在汉口创办师范学堂，1903年又在宜昌办师范学堂。

与此同时，新式教师的缺乏也严重影响中国新教育的发展。洋务教育办了三十年，其质量不高，关键是没有合格的师资和生源。各仁人志士办的学堂发展缓慢也源于师资匮乏。1896年，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撰写一篇《论师范》，明确提出开办师范学堂的主张：“师范之不立，自数百年以来矣！”“故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

19世纪末，国人中的先进分子开始建立师范学堂。1897年盛宣怀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师范院，这是中国最早的师范学堂。1902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于武昌创办湖北师范学堂，以培养中小学教员为目的。学员定额为120名，分一二年速成科和及三年本科。师范课程除了普通学外，还增加了教育学、卫生学、教授法、学校管理法等课程。1902年夏，贵阳乡绅于德凯、李端棻、李裕增、乐嘉藻四人集资创办贵州公立师范学堂。

虽然在癸卯学制之前我国建立的新式师范学堂凤毛麟角，但它们为我国培养现代学校的师资进行了可贵的探索。

第二节 中国最早的国办高等师范学堂的诞生

一、筹建中国近代第一所国办综合性大学堂

面对举国上下办学求新的形势，晚清帝国若仍顽固地维持传统封建社会的学校教育制度，必然要遭到历史的唾弃。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清王朝，为了能给外国侵略者和国内的爱国人士一个积极革新的形象，并同时为清王朝培养能够力挽狂澜的统治人才。清政府中的有识之士主张在京师创办新式学校，作为清廷竖立的一面旗帜，全面推动中国新教育的建立发展。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刑部侍郎李端芬上疏请立大学于京师，御使王鹏运上疏请兴学。

“臣闻国于天地，必有与立，言人才之多寡，系国势之强弱也”。“惟育才之法匪限于一途，作人之风当编于率土。臣请推广此意，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京师大学，选举贡监生年在三十以下者入学，其京官原学者听之。学中课程，一如省学，惟益加专精，各执一门，不迁其业，以三年为期。”^①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恳恩拨款开办”，并对京师大学堂的办学模式、办学宗旨、教学内容、师生来源等提出了一整套办法。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清军机大臣与总理衙门私请梁启超起草了一份《京师大学堂章程》。该章程确定了京师大学堂的综合性质——设普通学与专门学两类课程。普通学相

^① 汤志钧，陈祖恩：《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116～118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

当于今天的通识阶段，专门学则是专业阶段。鉴于中国传统教育为官吏教育，新时代的统治人才的培养被看作是京师大学堂最为重要的任务。而“西国最重师范学堂，盖必教习得人，然后学生易于成就。中国向无此举，故各省学堂不能收效。今当于堂中别立一师范斋以养教习之才”^①。因而，当时确定的专门学仅为两个：一是培养官员的仕学馆，一为培养师资的师范馆。

在康、梁等维新人士和清统治者内部一部分期望国家强盛的官员的鼓动下，1898年，皇帝下诏“自王公至士庶，各宜努力发奋，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博采西学切于时务者，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京师大学为各省首倡，应首先举办”^②，并下诏“即着照所拟办理，派孙家鼐管理学堂事务”，筹办京师大学堂。

是年，分管校舍建设的奕劻和许应骙选校址于地安门内原乾隆皇帝第四个女儿和嘉公主的一所空闲的府邸。然而，由于戊戌变法失败的影响，京师大学堂只建立了一个仕学院，被认为尤为重要的师范斋并未建立起来。1899年1月7日（光绪二十四年），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高等学府正式开学了。但它仍不能算作一所真正的现代大学。当时京师大学堂的学生分三类：凡进士、举人出身，七品以上的京官来入学的，称为仕学院学生；凡进士及举、贡、监

① 汤志钧，陈祖恩：《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126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

② 毛子永等：《学府纪闻——国立北京大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1